

◀ (上接9版)

难得，也对建康城研究有深远的贡献。此后的学者则多从朱偁先生的观点出发，基于不同史料对其观点进行小范围的补正，但还未能真正推进对建康城的认识模式。随着文献资料搜检范围的扩展以及研究的深入，到上世纪90年代郭湖生先生的《六朝建康》(1993)、《台城考》(1997)和马伯伦、刘晓梵所编《南京建置志》(1994)，建康城的研究大大地向前进了一步。

此外，在这里想重点提一下的是日本学者外村中先生所撰《六朝建康都城宫城考》(1998)一文。外村先生基于六朝唐宋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得出的复原图，与后来基于部分发掘资料所复原的图非常相近。从外村先生的这项工作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实只要认真梳理历史文献，不轻信明清以后的方志及地方文人著述，就有可能复原出六朝建康城的基本框架来。当然都城墙、环濠、城门、宫城墙、宫殿、水系等构成都城的具体要素，最终还是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一点一点摸索的。

文汇报：您的研究目前处于什么程度？我们知道您在2015年发表的《所谓“中世纪都城”——以东晋南朝建康城为中心》一文中，将始于曹魏、终于隋唐的历代都城所特有的规制命名为“中世纪都城”。可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概念？

张学锋：我认为“中世纪都城”有六项基本特征：有明显的城市中轴线；宫城位于中轴线北端；政府衙署分列于宫城南侧的中轴线两侧；宫城之北设有广阔的苑囿；宫城及政府衙署所在地的东、南、西三面规划整齐划一的里坊；城市管理上实行宵禁制。“中世纪都城”在华北地区始于曹魏邺城，以后的北魏平城、北魏洛阳、东魏北齐邺南城、隋唐长安城、洛阳城均踵其迹。

“中世纪都城”有别于古代都城的多宫制形式，它的出现，与中国从3世纪开始进入中世纪社会的步调一致。东晋南朝虽然立国于江南，但东晋成帝时规划设计的建康城，也没有逸出中世纪这一时代的框架，成为中世纪都城发展史上的关键一环。如果把“中世纪都城”和“近世都城”连贯起来看，中世纪都城又有大而不当及过于封闭的缺点，因此，当社会迈入近世以后，人们在利用中世纪都市的同时，无一例外地对其进行了整改，抛弃了封闭的坊市，城市的空间范围大大缩小。

这些问题我在另一篇文章《“近世都城”的出发——以南唐金陵城为例》里做了讨论。总之，近世都城正朝着更加开放、更加合理化的方向发展演变，建于六朝都城基础上的杨吴南唐金陵城也不例外。

这些认识主要来自文献中关于城市空间的记载以及对历史背景的考察，思路和结论是否准确，需要考古资料验证。虽然已经有一些发掘地点的资料可以支持，然而目前建康城的田野资料总体而言还相当有限，加之建康城沿用的时间又非常长，因此，不同时期的城市格局、宫殿、苑囿的位置等等，太多的具体问题还无法展开，所以要期待今后田野工作的积累。也正因为如此，这里提供的建康城图只是东晋规划新都时的一个示意图(见9版)。

如果熟稔文献资料，哪怕是淤泥，也可以成为复原城市遗址的“史料”

文汇报：您刚才提到，迄今为止的发掘资料尚未正式公布，而且由于六朝建康城直接叠压在今天南京繁华街区之下，考古工作困难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做怎样的努力推进建康城的研究呢？

张学锋：确实无法做到有计划地展开，只能见缝插针，能做一点是一点。但有两方面的工作是可以且亟需展开的。

第一是对文物部门的期望。前面曾经提到过建康城考古的难度，尤其是与长安城、邺城、洛阳城相比，难度真的是太大了。然而，能做的工作还是有的，整理既有的资料是当务之急。

在2008年的“六朝建康都城学术研讨会”上，徐莘芳先生就再三强调必须要有一张建康城遗址总图，发掘一个点就补上一个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图至今尚未看到。建康城遗址总图对研究的展开至关重要，但绘制总图的前提是对田野资料的逐一整理，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不是管理层下一道命令就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我想，逐一整理资料才是考古部门的当务之急。

我非常希望能设立专门的城市考古部门，在展开新的考古项目的同时，分出力量整理近20年来的建康城考古成果，从而绘制“六朝建康城遗址分布总图”。这样能够促进不同发掘人员的相互了解，有利于形成整个考古研究院对南京城市考古的共识，发挥集体力量，更

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从事建康城考古的工作人员应该熟悉总图上的每一处遗迹，并密切关注时下城市建设的新动向，不断发现新的可发掘地点，完善总图。

第二是考古单位以外的研究者都能够参与的，就是详细梳理与建康城空间布局相关的文献史料，随时准备与考古资料对接。

众所周知，《三辅黄图》对于西汉长安城、《洛阳伽蓝记》对于北魏洛阳城、《长安志》对于隋唐长安城都是关键的文献史料，对建康城而言，最重要的一部文献就是唐人许嵩编撰的《建康实录》了。虽然《建康实录》中与建康空间有关的内容大多属于许嵩的自注，分量也不是太多，但因成书较早，所引六朝人的著述也比较丰富，因此对建康城研究而言弥足珍贵，史料价值远超宋元以降的方志及明清地方文人著述，非常值得关注。

这部书我以前也读过，但当时只是把它单纯地作为历史文献在读，只有时间脉络，少有空间概念。现在有了一些可作参照的考古材料后，阅读时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文汇报：可否给我们讲讲具体的例子？

张学锋：有很多。例如，今六朝博物馆地下一层的夯土城墙遗址，原本我们都觉得这是都城的城墙遗址，因为外面有二十余米宽的护城濠。但从复原的位置上来看，又应该属于宫城的东墙。我们读《建康实录》时看到一条材料，说宫城城墙外有城濠，城墙与城濠之间的空隙种的是橘子树，墙内种的是石榴树。宫城外有城濠这条记载，让这段城墙遗址应该是宫城东墙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南京大行宫工地出土东晋砖铺道路及侧沟



南京市大行宫工地清理的六朝早期木桥桥桩

依据《建康实录》的正文及许嵩的自注，我们基本上可以画出类似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中所附的唐长安城宫都示意图来，这样的图虽然不够精准，但会对今后的考古工作有很大帮助。

我还想讲两个具体事例，一开始都是觉得得不出什么结论，而在进一步结合文献后，就能够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

多年前，在南京市中心的明瓦廊北口与石鼓路交界处曾进行过配合基建的考古发掘，结果都是淤泥，似乎没什么发现。其实这也是许多城市考古最后给出的结论。然而，如果事先通过文献对历史上南京的城市结构有所了解，那么，这个地点的淤泥也就有价值了。根据文献记载，东晋南朝建康城的西墙外有一条人工运河，叫作运渎。但它具体在哪里，文献里不可能有答案。在我看来，明瓦廊北口发现的淤泥就是运渎中的淤泥，由此我们就能确定建康都城的西界。可见对历史文献的熟悉程度直接影响到对考古遗存性质的判断。

文汇报：这是确定建康城西界的问题，那么东界呢？

张学锋：在六朝博物馆往东不足两百米的毗卢寺西侧，前不久南京市文物部门正在进行发掘。此处遗址是一个很大的水塘，发掘范围正好在水塘的岸边，由南往北倾斜。水塘里的主要堆积是包含前代遗物在内的宋代建筑垃圾。宋代堆积层上是平整过的明代层，再往上就是清代地层，而宋代堆积层以下直至生土层，未能确认到六朝隋唐的地层。

尽管在这里没有发掘出我们通常认识中的有价值的文物，但是结合历史文献，就能从这个地层的叠压关系及所含遗物中做出这样一个判断：这个

地方是六朝隋唐青溪的一部分，五代十国时期杨吴南唐重新规划金陵城之际，把素有九曲之称的青溪拉直作为东城濠，青溪弯曲的部分就在城内形成一个个水塘。宋代以后，尤其是进入南宋以后，建康府作为留都，人口大量增长，这些水塘就慢慢地被建筑垃圾填塞了。南京著名的秦淮河，按照唐人道宣的记录，宽度为一百步，约合今140—150米，而今天流经市区的秦淮河(除夫子庙前那一段外)宽度都不足20米，同样是在宋代以后随着人口增长被慢慢地填塞了。

据历史文献记载，六朝都城建康以青溪为东界，因此，毗卢寺西侧这个地点，对于确定建康城的东界意义重大。水塘堆积中出土瓦当、筒瓦、板瓦等较多的东晋南朝遗物，制作精良，是高等级建筑上的建材。由此我们还可以判断，这些建材是开皇九年(589)隋平陈以后将建康城“平荡耕垦”时留下的遗物。

还有一个例子，也是最近的一次发掘。在利济巷侵华日军慰安所旧址东侧地块进行钻探，钻探的结果推测也是一条河道的一部分。面对这样一处地下遗存，较多的意见仍然是“没什么”，似乎要放弃。但是，在建康城的初步复原示意图上，这条水道与六朝博物馆地下保存的城濠是在同一条线上的。这样一来，慰安所东侧的此处河道淤泥也就不再是一般的“淤泥”了，它极有可能来自建康宫城东墙外城濠，是解决六朝宫城东墙位置的重要参照地点。

文汇报：因此，如果我们有了基于文献的预设，在真正面对出土遗迹、现象时，就能更快地做出一些判断？

(下转11版) ▶



南京大行宫工地南朝房屋遗址之间的排水通道